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三辑

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1900—2000

郑大华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YI HONG JI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HOUSE

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1900—2000)

郑先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1900—2000)/郑先兴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三辑)

ISBN 7-80109-996-6

I. 文… II. 郑… III. 文化史—研究 IV. K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3249 号

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1900—2000)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楼 3 层(100035)

电 话:66562725 66562726(编辑部) 81551485(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ctp.com.cn>

E-mai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352 千字

印 张:13.75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240.00 元(本册 32.00 元)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冲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迸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

“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 4. 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中文提要

本论文旨在回顾和检讨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有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史理论)与实践,通过梳理其发展脉络,总结其成就得失,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特点。

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即把文化史研究置于整个 20 世纪前期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背景下,通过对期间流行的各种文化史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考察,来揭示这一史学分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趋势及特点,以便为今日的文化史研究和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全文除“导言”部分的学术史回顾和论文研究思路说明外,正文凡五章:

第一章为“文明史研究时期(1900—1915)”,主要讨论清末以后国外“文明史观”及其理论的传人对中国史坛的影响。文中首先考察了英国巴克尔和日本福泽谕吉的文明史研究理论输入及其内涵,认为其核心思想是把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是使史学成为科学。当然,巴克尔与福泽谕吉是不同的。前者所探究的历史进步是对当时英国强大的炫耀和对科学的崇信;而后者则是对进步的苛求和对科学的实验。接着分别论述了梁启超、邓实和陈黻宸等人对于文明史研究理论的理解和阐释,并对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和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等史学著作做了评述。指出文明史家渴望进步,只是由于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使他们在从事这项讨论时,其关注点往往更多地集中在民族性和民族生存问题面不是科学性方面,有的则把科学简单地解释为分科之学。这不仅与巴克尔的初衷不同,而且与福泽谕吉的理解也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误解的出现,显然与 20 世纪初国内的社会环境有关。

第二章为“文化史研究的诞生时期(1915—1927)”,探究了“五四”期间国内文化史研究风气日盛的原因,着重结合当时各种西方文化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考察分析了梁启超、柳诒徵、陈登原、朱谦之和张东荪等人的文化史研究实践。认为此期西方文化史研究理论的输入规模较为宏阔,不仅和国际史学并轨,且呈现百家争鸣的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新史学”、新人文主义、新生机主义和唯物史观以及由孙中山先生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思想而创立的三民主义(唯物史观和三民主义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实践我们将放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新史学”以鲁滨逊、李凯尔特为代表,关注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主张重点研究平民生活,认为史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新人文主义者以白璧德为代表,关注精神、道德在文化史发展上的作用,主张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认为史学的意义在于教育。新生机主义者以柏格森、杜里舒为代表,关注文化史发展动因,将人类的创造动因看作是本能与知识,主张史学研究采用生物学的方法。从实践上看,其时文化史研究的成果虽然不是很多,有的且未完成,但大多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如梁启超《中国文化史》对于“新史学”理论的实践,柳诒徵具有文化守成倾向的《中国文化史》写作,朱谦之《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对生机主义等文化观念的展示等,其影响决不可小视。

第三章为“文化史研究的繁荣时期(1927—1937)”,认为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开展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文化建设的讨论,以及西方文化史论著的系统译介和文化学学科的建立,从各个方面促进了文化史研究的繁荣。在当时流行的文化理论中,社会科学观念以关注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下层的生活著称,在方法上采用分科研究;文化人类学则关注域外文化的传播,采用比较的方法;三民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关注的是民族、民权和民生,地望观念则关注的是家乡文化史,这两种文化史研究理论可以说都是本土自生的。这一时期出版的商务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吕思勉、王德华、王治心等人的文化史论著,陈安仁的《中国文化史全书》,张立志的《山东文化史研究》和吴越研究会的《吴越文

化论丛》,刘华瑞的《中国文化国际关系》、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和罗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等,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史理论的同时,已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它标志着我国的文化史学科建设正逐步走向成熟。

第四章为“文化史研究的经世时期(1937—1949)”,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成为学术思想界最具感召力的灵魂,文化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本章结合时代背景简略考察了文化民族主义者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分析了文化形态学派的文化史研究理论,较详尽地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一文化理论在国内的传播情况和“战国策”派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时代之波》和《文化形态史观》等论著;重点分析唯物史观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以及30年代的杨东蓀、陈国强和陈高佣与40年代延安的陈竺同和《中国文化》杂志的研究实践。从中展示出文化史研究与社会及民族生命息息相关的特征。

第五章为“文化史研究的再度繁荣时期(1980—2000)”,本章考察分析了文化史研究再度繁荣的原因,重点论述了当代学者对于文化史学科理论的设想以及各级各类的文化史教材,论述了“文化圈”、“行政区”和“一体多元”等地域观念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各种文化史著,通史观念之下的《中国文化通志》、《中华文明史》和《中国文化通史》,轴心期理论下对于传统经典的重新阐释。

“结束语”,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从历史的现代化途径、史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角度,分析了20世纪文化史研究的得失。认为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的本质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存废问题之上的制度变革和风俗改良,它与现代化的实现和发展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因而,文化史研究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相当成绩,但整体说来,并不理想。因为至今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并没有建立,“很多人说不清楚文化史的意义”;文化史研究在整个史学界还不占主导地位。就史学的科学化而言,学者所理解的科学就不一致,梁启超认为是平民化,朱谦之认为是生物学,胡适认为则是分科之学,可以说是莫衷一是。总结20世纪的经验,今后文化史研究的趋向,似乎仍在于:以探讨现代化

为己任;继续加强文化史的学科建设;继续实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具体说就是“总体史以观其势,分科史以求其理”;在编纂方法上,讲究知识性、趣味性和科学性。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give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n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by the Chinese scholars of the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those theories from the West. By summariz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losses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period of history, it reveals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its way to modernization.

As the basic research method, the article puts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histo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 changes and the collisions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20th century, trying to achieve a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n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popular during this period of history, the basic tendenc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branch of historiography are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so that some ideas significant for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oday could be uncovered.

The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 conclusion before and after them respectively.

Chapter One deals with "the period of civilization research (1900—1915)", discussing mainly the introduction and its impact of foreign ideas and theories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on Chinese academia of historiography in late Qing dynasty. As a first step,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ies on the research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by Henry Thomas Buckle of England and Fukuzawa Yukichi of Japan is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contents, research methods, differenc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theories. Then, the article

turns to such Chinese scholars as Liang Qichao, Deng Shi, and Chen Fuchen for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of the theories on the research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makes some comments on some works of historiography by Liang Qichao, Liu Shipei, Cai Yuanpei and Zhang Liang. It is pointed out in the end that Chinese scholars, due to the national crisis of that time before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concentrate more on the nationality and the national survival instead of the scientificness in their discussion of the subject. This certainly causes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Buckle's theories and has to do with the Chinese social environment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apter Two is concerned with "the period of naissance for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1915—1927)". It mainly explains the reasons why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history became popular in china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s in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by such Chinese scholars as Liang Qichao, Liu Yizheng, Chen Dengyuan, Zhu Qianzhi and Zhu Dongsun at a time when various Western theories on cultural history were introduced in China. A major point of the chapter on the subject i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on the research was grand and wide, not only closely following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of history, but also creating a tendency of free academic content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s, among which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e New Historiography, New Humanism, New Vi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People raised by Sun Yat - Sen. A brief introduction at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is given about the contents, the representative theorists and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all these schools mentioned above.

Chapter Three is about the "the period of prosperity for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1927—1937)". It is held in this chapter that the debate on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society, the discussion on the building of cul-

tu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orks of 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ience of culture as an academic study all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in every aspect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Among the popular theories on culture, social sciences were noted for their concern for social life, especially for the life at the lower level of the society, with analytics as its approach of research, while cultural anthropology were mostly concerned about the spreading of foreign cultures, using comparison as its method of research. The two native-born ideas on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are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People, which, as political thoughts, pays its attention to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idea of provincialism that cares mainly fo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 local place. The academic works published during this time include The Series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 Complet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handong, etc. . These publications started to show their own features in the course of the absorp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on cultural history and indicates the increasing maturity of the study on the cultural history.

Chapter Four is about the "the period of nationalism in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1937—1949)".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nationalism is the most appealing soul in the Chinese academia, certainly including the field of cultural history. So, in this chapter the book,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by Qian Mu, a cultural nationalist, is discuss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at period of tim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ries of cultural morphologists are analyzed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spreading of these theories in China after 1920s. The major discussion of this chapter, however, is about the materialist theories on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research practices conducted by Yang Dongchen, Chen Guoqiang and Chen Gaoyong in the 1930s, Chen Zhutong, with the magazin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1940s. All these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survival.

Chapter Five deals with "the reflourishing period of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history (1980—2000)",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history, the idea of provincialism, the idea of general history and works on cultural history under the guide of the axis theory.

On the basis of all the discussions in the previous chapters, the conclusion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gains and the losse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n goes on to depict a view of its future trends. It believes that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is essentially an institutional renovation and custom improvement around the maintenance and the discarding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is still left far behind of the re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On the whole, the research has not reached an ideal level, though great progress has already been made. In fact its significance has not been clearly understood due to the lack of academic criteria and a scientific system for the research, and its statu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history is not important yet. In light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rend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seems to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way of the research to modernization,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study and to experiment with new scientific approaches and techniques for the research. As for the writing,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knowledge, entertainment and scientificity of the research.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文明史研究时期(1900—1915)	(18)
第一节 呼唤文明:文明史研究产生的原因	(18)
第二节 “进步”与“科学”:文明史研究的理论	(25)
一、“进步”与“科学”:巴克尔的史学的新理念	(25)
二、“进步”与“科学”:福泽谕吉文明史观	(33)
第三节 “民族史”、“国民史”与“分科之学”:文明史研究的实践	(41)
一、从《新史学》到《读史总论》:中国文明史研究的理论构建	(41)
二、从《论文明之义》到《中国风俗史》:中国文明史研究的实践成果	(48)
三、结语	(59)
第二章 文化史研究的诞生时期(1915—1927)	(61)
第一节 千呼万唤始出来:“五四”催生文化史研究	(62)
一、孕育:中西文化问题讨论中的文化史研究实践	(62)
二、初生:国故学讨论者所设计的文化史研究	(71)
三、长成:文化史研究走入课堂	(77)
四、附录: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	(86)
第二节 “新史学”思潮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92)
一、“人类的问题”与“价值”:文化史研究的新观念	(93)
二、“人类社会”与“科学”:梁启超文化史研究的实践	(101)
三、结语	(118)
第三节 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柳诒徵、陈登原)的文化史研究	(120)
一、“想象”与“同情”:白璧德的文化史观	(120)

二、“独异”“批评”与“独造”：学衡派的文化史研究实践	(126)
三、结语	(145)
第四节 新生机主义与文化史研究	(148)
一、“创化”与“进化”：新生机主义的文化史研究理论	(148)
二、“知识”“本能”与“文化”：新生机主义的研究实践	(154)
三、结语	(168)
第三章 文化史研究的繁荣时期(1927—1937)	(170)
第一节 文化活动促荣文化史研究	(171)
一、社会史与文化建设的讨论：文化史研究的社会氛围	(171)
二、“文化协会”与“社联”：文化史研究的组织保证	(175)
三、外事与译介：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源泉	(178)
四、文化学：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构建	(180)
第二节 社会科学：文化史研究的新天地	(186)
一、社会科学：文化史研究的新理念	(187)
二、“通史”与“专史”：社会科学观念的文化史研究实践	(196)
三、结语	(217)
第三节 文化人类学与文化史研究	(219)
一、科学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念	(219)
二、“播化论”：域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史	(223)
三、结语	(232)
第四节 “爱和平”与“先民创造的成绩” ——三民主义与陈安仁的文化史研究	(233)
一、“爱和平”“不知自由”与“求生存”：三民主义的文化史观	(233)
二、“先民创造成绩”的体现：陈安仁的文化史研究实践	(241)
三、结语	(251)
第五节 地望观念与文化史研究(上)	(252)
一、从“南方文化运动”到“江浙文化论”：地望的文化史观	(252)
二、谁主宰中国：地望观念的文化史研究实践	(258)
三、结语	(268)